

# 回忆大学生活

□ 任玉新 (力学系流3班)



今年我们毕业20周年。从1983年进入清华力学系流3班开始，我已经在清华学习和工作了25年。在清华的25年，经历的事情不算少，但印象最深刻还是大学阶段。上大学是我人生的一个转折点。在大学的5年中，从陌生、新奇到融入沸腾的的大学生活，我深深感受到清华大学“自强不息，厚德载物”的精神。5年的大学生活，为我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。回忆那段日子，在感叹时光飞逝的同时，也不禁意识到现在的学校和社会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，和25年前已有天壤之别。所以，我想把旧时记忆中的点点滴滴写出来，与大家尤其是年轻的大学生们分享，也算是对逝去的大学时光的纪念吧。

## 老师们

刚上大学时，给我最深印象的就是学校的老师。印象中那时的老师讲课都很有特色，有的有条不

紊，有的慷慨陈词，都有一手“绝活”。教我们高等数学的施老师，个子不高、似乎永远都穿着蓝色的中山装。一来到教室，第一件事就是把玻璃杯放到讲台上，课间偶尔还拿出一支烟，在那里喷云吐雾。他讲课语速很慢，但讲得非常清楚，经常打一些通俗易懂的比方。在不知不觉中，我学会了语言，学会了微分、积分，竟然没有感到过数学的枯燥。教我们数学习题课的是吴老师，她瘦小干练，讲话带着南方口音。她每次上课都准备充分，讲例题一气呵成，同学们都非常佩服。教普通物理力学、热学部分的老师姓崔，气宇轩昂，讲课很有激情。说起来，我在大学阶段的力学知识，首先得益于他的教导。上物理习题课的王老师30多岁，工作非常认真，要求也非常严格，同学们都有点怕他。有一个南方的同学，在回答王老师提问时紧张得把普通话都忘了，说出来的全是谁也听不懂的家乡话，老师也只好让他坐下。我那时写作业不太工整，有时为了图方便，把解答写在作业本顶部和底部的横线之外。每当这个时候，我在批改完的作业本上，都会看到老师的评语：“不要写在‘天头’、‘地头’！”几次下来，我的作业

写的规范多了。

后来，我们的力学课逐渐多了起来，理力、材力、弹性力学、流体力学、气体力学、粘性流体、计算流体……在上课过程中，我们不仅学到了力学知识，也领略了力学系老师的风采。由于老师太多，难以一一记述。我总的感觉是力学系的老师在讲课时有很好的大局观，讲课注重基本概念，注重学科体系的完整性，在这一点上和上基础课的老师有明显的不同。例如，大家都认为流体力学是一门很难的课，但当你听张兆顺老师讲的流体力学的时候，却不觉得有多难。因为他把概念讲得特别清楚，概念讲清楚了，本来繁琐的数学推演也变得有章可循。感谢力学系的老师们，是他们让我知道了力学，尤其是流体力学，这给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

## 看电影

除了看电影，我很难回忆起刚上大学的时候还有什么别的娱乐活动。跳舞、经商都是85年以后才逐渐流行的。我印象最深的是入学几天后的第一场电影。好像是学校统一组织观看的，电影的名字我也早就忘记了。晚上7点钟走进大礼堂的时候，天还亮着。当电影结束，来到大礼堂外面，夜色已经降临。走在外面路灯昏暗的小路上，我忽然有种熟悉又陌生的感觉：我仿佛走在家乡的小路上，而耳边又是刚刚结识的同学的笑语。我离开家乡后，第一次感觉到有点想家了。随

着慢慢熟悉大学生活，这种思乡之情渐渐被冲淡了。在紧张的学习之余，看电影就成了我最好的消遣。那时学生会偶尔会组织看一些所谓“参考片”，其实大多是美国二战题材的老电影。看这些老电影，要去五道口“东升影剧院”——现在似乎已经被拆掉了。当时，大家对这些电影感觉还是挺新奇的。不过，更多的时候还是在清华大礼堂看电影。那时，清华的大礼堂不定期放电影，大概每个星期一两次。

在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的电影很红火。一放新电影，大礼堂旁的旧西阶后面就会排起长长的买票的队伍——有时长达百米。而且，很多排队的同学都肩负着给一个宿舍甚至半个班的同学买票的重任。往往队伍还有几十米长，票就卖完了。所以，如果能在排队的同学中发现一个熟人，是很令人兴奋的一件事。不过，大多数情况是根本没时间买票，或者不知道有好电影要放映。这时，如果还想看，唯一的办法是在开演前到大礼堂前等人退票了。有一次，我们班的一个同学——现在已经

是事业有成的企业家了——去等退票，他见到一个人低着头慢慢的在大礼堂前的路上徘徊，似乎有退票的意思，就赶忙上前搭腔，用的是当时买退票的标准用语：“师傅，有富余票吗？”等对方抬起头来，这位同学顿时吃了一惊：原来前面赫然站立着一个我们的老师，正向他怒目而视，而他正好是这位老师的课代表！这位老兄被吓得落荒而逃，这件事也成为我们班的“佳话”之一。

毕业后，看电影的次数越来越

少了，有时一两年也看不上一次。回想起来，真的很怀念那段有心情去看电影的日子。

### 上自习

上自习是大学生活的重要内容。我们班的同学大都学习刻苦，除了上课和体育锻炼，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教室上自习。我们上大学时，三教还没有启用，学校的教室很不充足。所以，找自习教室，



就成了我们最头疼的事。慢慢的，大家也摸索出一些规律：自习教室的“人口密度”正比于教室设施的质量。出发早的，可以去新建的三教；晚一点去一教、二教，或者清华学堂的绘图教室；再晚一点，可以去新水、旧水和主楼里零散分布的教室；最后，就只好去西阶和三院。现在，三院的原址上是图书馆的新馆，西阶也已于去年重建，以后的同学可能很难想象当时的风貌了。旧西阶桌椅都很陈旧，进入和走出座位，都会发出刺耳的噪音；三院历史悠久，已有些破败，而且

是学校里冬天唯一用煤炉取暖的教室。这两个地方自习的人少也就不难理解了。很不幸，我是这两个地方的“常客”。年轻人贪睡，而我又是在同学中午睡起床比较晚的。起床后，不忍在宿舍虚度时光，只好约一两个同好，直奔三院。等我们回来吃晚饭，有的同学已经动身去三教了——看来晚自习只好在西阶度过了。

那时的同学们真是很“用功”。有一次，我在一教自习，忽然教室停电了。我还在犹豫是否回宿舍，已经听到下面人声鼎沸。隔窗看去，有大队人马骑车向西。一问才知道，原来同学们要去北大自习。我也跟着车流进入北大。不过，北大的教室似乎也不宽裕，个个爆满。我转了一圈，只好又回来了。

即使在学习不是很紧张的时候，大家也会习惯性地上自习。不过，这时可以稍稍“休闲”一下。几个同学约好时间，出新水、一教或清华学堂，在礼堂前的草坪集合。我们在轻抚的晚风中谈天说地，说古论今。有时带上扑克，打几把“争上游”。然后，得分垫底的出钱、倒数第二的跑腿，去旁边的小摊买几根冰棍儿，大家共享。

现在，那些卖冰棍儿的小摊应该还在吧。可是，自从换上新草，草坪早已“禁止入内”了——时过境迁，我的大学生活也似乎离我越来越远。有时三两同学相聚，一定会谈起大学时的老师，谈起看电影、上自习的趣闻。很多事情说起来，就好像发生在昨天一样。五年的大学生活，是我们最重的一笔人生财富。☑